「臺灣歷史考古」專號
考古人類學刊・第 76 期・頁 1-4・2012

導　言

趙 金 勇*

耗時十載編纂的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開宗明義說到：「歷史考古是考古學研究中變化最快、最具活力的領域之一」（Majewski and Gaimster 2009：xvii）。台灣有系統的歷史考古研究約莫出現於 1980 年代，早期的發展無論質或量都只能說是這個學科的邊緣。不過到了「2009 年度台灣考古工作會報」，歷史考古研究的數量已經成長到會議報告的四分之一，可謂「盛況空前」（陳玉美 2012：2）。

雖說歷史考古還不能算是台灣考古學的主流，不過，迄今學界也已發表了數篇的回顧性專文（陳玉美 2012；劉益昌 2008；臧振華 1997, 2006）。這裡無意贅述，僅簡論台灣歷史考古發展的概況。劉氏一文認為早期學者研究西荷在台的遺跡，但對於歷史遺物反倒不太重視。光復前後，國內興起對於漢人拓殖台澎地區歷史的討論興趣，不過由於相關文獻史料零散，聚訟紛紜，莫衷一是。1980 年代，解嚴之後台灣史的研究崛起，相關的歷史考古學研究亦逐步啟動，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展的「澎湖群島古代人類拓殖史的考古學研究」和「台灣早期漢人及平埔族聚落的考古學研究」等計畫，並發掘了八里十三行遺址以及左營舊城等處，乃是從考古學的手段參與台灣早期歷史的研究，「肯定了對明鄭以來漢人早期聚落進行考古學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臧振華 1997：733），可謂開了針對台灣歷史之考古研究的先河。

萌蘗於以聚落為焦點的研究取向，數年間陸續出現左營舊城外興隆營區、台南熱蘭遮城（王城）、北港和笨港古村落等歷史時期的考古遺址的發掘工作，對台灣史研究作出更積極的貢獻。然而，台灣的歷史考古學真正跨出大步，可能還是受惠於近年來大量與文化資產處理相關的發掘研究計畫。考古學的社會實踐和國家的意識與操作往往亦伴亦趨，這在世界各地屢見不鮮（參見如 Kohl and Fawcett 1995）。從這個角度來說，後解嚴時代台灣歷史考古學的快速發展並不不令人意外。

不過總的來說，相較於中國大陸和日本兩脈可謂是台灣考古源流的地區，本地的歷史考古學發展確實相對遲滯。陳玉美（2012：3）認為「這恐怕與『台灣固無史也』的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人文科學中心考古專題中心助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點，有密切的關係」。她的觀點仍或有爭議，但是，卻捕捉到了研究者心裡層面的潛藏因素。從另一方面來看，台灣早期歷史發展與北美洲的殖民過程，其實存在不少相似之處（臧振華 1990：50）。若我們把兩地的歷史進程放在下面的對應性結構中比較，更能看出台、美兩地 16-18 世紀拓殖過程的共同之處，反而迥異於中、日等擁有長久文字歷史的地區。換言之，對於當代社會（和學界）主流的族群人口而言，「台灣固無史」實非「無史」也，唯其欠缺足以榮耀我族之史罷爾！

16-18 世紀：外來者（少數）／土著（多數）

有文字歷史／無文字歷史

優勢文化／劣勢文化

當代主流族群（多數）／原住民族（少數）

台灣考古學從 1980 年代開始接受到美國考古學的影響，特別是所謂「新考古學」或歷程考古學，提出要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考古材料（李光周 1985）。這個學理上轉變的時間點，恰恰與開始從考古材料討論台灣史是一致的，應非偶然。影響所及，上述以聚落考古為核心的歷史考古研究，透過考古學的手段和人類學的思考，對於更積極回應台灣早期歷史的研究，開啟了諸端。可以肯定的，歷史考古學的未來發展必然是走向更多元的學科討論，在理論層面，則要拋開對於「史料」和「物質」的掙扎與辯論，邁向人類學和歷史學兼備的歷史考古學（Majewski and Gaimster 2009：xviii）。

放在這樣的學科發展脈絡來看，這裡收錄的三篇文章格外顯得有意義。首先，談到貴重商品，英美「主流」的歷史考古學基本上以十五、六世紀以來，歐洲人在美洲和亞、非洲的殖民過程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其時代背景是大規模海上貿易以及世界體系形成，很自然地，貿易商品和物資交換可說是許多歷史考古研究的核心課題之一。台灣歷史考古更是不能自外，然而，諸多相關的議題和環節仍須釐清。張光仁〈考古資料的脈絡分析：以瑪瑙珠與硬陶甕為例談起〉一文從理論層面探討出發，質疑研究者將貿易陶瓷或瑪瑙珠等外來物質理所當然的視為一種奢侈珍品（筆者按：譬如 Chao 2011 即是一例）。考古學家更應該探究的是，器物從原本的「外來物」地位，經過「再脈絡化」的過程，最後轉換成具備特殊文化地位之「原生物」的變遷過程。此一深具人類學思維的課題，為台灣歷史考古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討論方向。

第二篇文章謝艾倫的〈淇武蘭遺址上文化層的外來陶瓷：一個歷史考古學的研究〉，同樣聚焦於「外來物」和「原生物」的討論，將考古材料放在遺址層位的脈絡中來與文字史料對話，述說一段千里外來之陶瓷器如何參與淇武蘭地區文化變遷的故事。作者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地生產的幾何印紋陶為分析之背景訊息，討論外來陶瓷器在數量和品類上的意義，認為淇武蘭遺址層位上明顯的兩段高峰期各有其不同的社會意涵。前段高峰受到整個東亞區域貿易興盛的影響，與此同時，聚落內部人口也呈現高度成長，內外的發展相輔相成。這樣的看法，遠比單純從文獻分析而簡單地歸因於西班牙人的經營更站得住腳。後一段高峰則反映出漢人移入宜蘭地區之後，所產生的人口結構改變。簡言之，造成前後兩段外來陶瓷器高峰期的因素，截然不同，不可混為一談。該文的結論提出，漢人拓殖應不是噶瑪蘭文化衰退的唯一原因。謝氏的研究顯示唯有透過整合考古和文獻材料，才能精緻地描述台灣晚近的發展歷程。

趙、鍾兩位的「近現代」考古則是一個新開發的研究領域，代表了考古學把研究對象的時間深度往近代拉的努力。日治時期可以說是台灣社會集體記憶（或遺忘）的邊緣，在我們特殊的歷史脈絡上至關要緊。既然考古材料的特性在於刻劃不落文字的生活細節，歷史考古學自不應從近代台灣研究中缺席。〈花岡山與大龍峒遺址的近現代陶瓷消費〉一文，分析實際考古出土的材料，探索物質文化和背後社會之間的互動。作者特別著墨於消費文化與殖民意識、社區結構以及公私空間領域之間，幽微但是無所不在的複雜關係，嘗試走出陶瓷器研究僅及於物的框框。

台灣的歷史考古學發展了三十年，我們衷心期待這個研究領域擺脫了僅僅作為「歷史學仕女」的角色。歷史考古學作為考古學的分支學科，要能真正地開步走，不在於如何對抗「文字的獨裁」（tyranny of text，Thurston 1997），更重要的是要能提出本身的考古學問題。這個專號的策劃經過了漫長的兩年，雖然僅集結了三篇文章，但各篇均在探討重要的考古議題，期能開展台灣歷史考古學新一頁的契機。

引用書目

李光周

1985　〈臺灣：一個罕見的考古學實驗室〉。《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34：215-237。

陳玉美

2012　〈台灣的歷史考古學的研究〉。《田野考古》15（1）：1-17。

臧振華

1990　〈什麼是歷史考古學〉。《人類與文化》26：48-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7 〈考古學與臺灣史〉。刊於《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臧振華編，頁 721-742。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6 〈從考古學看台灣〉。刊於《台灣史十一講》。李明珠等編，頁 7-33。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劉益昌

2008 〈台灣歷史考古學研究歷史建築的過程與方法學的檢討〉。「建築考古的方法學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國立台灣博物館，7 月 12 日。

Thurston, Tina L.

1997 Historians, Prehistorians, and the Tyranny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Danish State Formation through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Dat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4(3/4): 239-263.

Kohl, Philip L. and Clare Fawcett, eds.

1995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o, Chin-yung

2011 The Tradeware Ceramics in Manatuto, East Timor and Their Social Implications. 《田野考古》14(1/2)：131-160。

Gaimster, David and Teresta Majewski .

2009 Int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David Gaimster and Teresita Majewski, eds. Pp. xvii-xx. New York, NY: Springer-Verla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